2022年7月2日 星期六
值班主任：岳嵬 主编：徐晗溪 美编：许丽 检校：叶健升 原中倩
海南日报

史鉴典录

史话海南志

■ 张兴吉

我国地方历史的编撰，开始于东汉，在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史地内容的“志”与“记”，自隋唐到宋代，此种方志的体例逐渐成熟，在元代以下，各个行政区划的层面都有志书，而且被更广泛地使用在山川、寺院等名胜的记述中。

海南自秦汉时期纳入中国的版图后，随着内地移民的逐渐进入，地方文化也日益发展，也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文化。其中以海南地方志的发展，表现得尤为突出。

宋元——海南学人作志书大都仅存书目

据《隋书·经籍志》记述：“《珠崖传》一卷，伪燕聘晋使盖泓撰。”这表明最早的海南地方志是东晋学人盖泓（北朝十六国燕人）所编纂的《珠崖志》。此书很早就亡佚了，散存资料保存在《初学记》《太平御览》中。隋唐两代，海南没有方志的记载。进入宋代，海南方志的编修进入了全新的时期，前后有琼州《图经》《琼管图经》（赵汝厦撰）《琼管志》《琼台志》《南宁军志》《吉阳军图经》（万安军）《图经》等地方志问世，只是至今也没有存世者，仅散见于其他史籍。

元朝一代重视地方志编纂。著名的镇、寺观、山川多有志书。但现在能够查考到元代海南编纂的方志仅有《琼海方舆志》和《临高县志》。《琼海方舆志》的编纂者为琼山人蔡微，乐会县教谕；《临高县志》作者为临高县学教谕冼雷。这二部志书皆已经散佚，《元史·艺文志》及明嘉靖《广东通志》中仅存其书目。

这些书籍是宋元时期海南人士仿效内地流行地方志而作，也是海南人文和自然开发的一种体现。这些书大都已经散佚，特别是宋代所编纂的海南岛地方志在明代已经散佚不存，没有传世，只能从《舆地纪胜》等书所引用的部分，了解其内在情况。

明代——正德《琼台志》为现今存世最早的海南地方志

进入明代后，海南地方更上一层楼，海南著名的学者王佐，可以说是撰写海南地方志书的第一人。据明代海南籍学人唐胄著明正德《琼台志》自序说：王佐曾经长年收集记录郡事，称为《琼台外记》。王佐、唐胄后来共同参与编修海南志书，但没有完成。后来唐胄自己续修完成书稿，在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编纂完成《琼台志》，是现存世最早的海南地方志。

明正德《琼台志》在很长时间内被认为已经散佚，清代经学家阮元《广东通志·艺文略》曾称此书已佚。后来《海南岛史》的作者、日本学者小叶田淳也没有看到传世的明正德《琼台志》，而采用了“阮志”（《广东通志》）的记载。

直到后来才发现明正德《琼台志》还保存在浙江天一阁中，且缺卷二十二、二十三，卷四十三、四十四，合计缺四卷。后有1964年上海古籍书店据天一阁藏本影印，还有2013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中华再造善本影印本，此书才广泛地流传。

目前，存世最早的海南方志除明正德《琼台志》外，还有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的《琼州府志》和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的《儋州志》，合计三种明代海南方志存世。明万历《琼州府志》十二卷，最初也不为人所知，最后发现此书保存在日本东京国立国会图书馆里，也是孤本。此书经小叶田淳在其著作《海南岛史》中使用后为世人所知，今天已经有各种影印本流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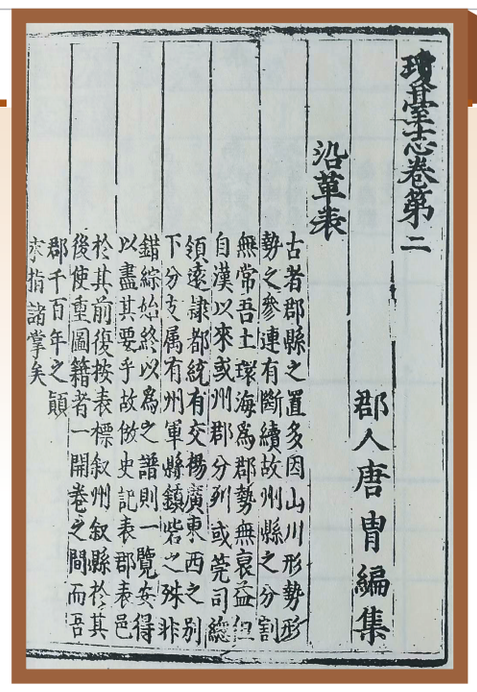
明万历《儋州志》为儋州知州曾邦泰所修，儒学学正吴云鸾等人编纂，仅保存于日本尊经阁文库。1990年，书目文献出版社（今天的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将其列入《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影印出版，此书才广为流传。

明代海南地方志的编纂超过以往历代，其中以嘉靖、万历两朝编修得最多。据《广东通志》、明正德《琼台志》及其他文人著述中记，明代海南方志共29种。

但除了明正德《琼台志》等3部传世外，其余均佚。已佚方志书目如下：明《琼台府志》（成化十四年）12卷，明正德《琼台志》存其序文。明《珠崖录》（王佐纂），明嘉靖、清道光《广东通志》中存其书目。《琼台外纪》（王佐纂），明正德《琼台志》有征引。此外，还有钟芳所编的《崖州志略》，郑廷鹄所编的《琼志稿》等书，但是这些书全都没有保存到现在。

明正德《琼台志》的纂修者唐胄的画像。 本报记者 陈耿 摄

清代——海南方志存世最多，有最全海南方志丛书



瑰異志卷第二
沿革表
郡人唐胄編集
古者郡縣之置多因山川形勢形勢之參連有斷續故州縣之分割無常吾土瓊海爲郡勢無衰益自漢以來或州郡分列或莞司總領遠隸都統有交楊廣東西之別下分支屬有州軍縣鎮砦之殊非錯綜始終以爲之譜則一覽安得以盡其要乎故倣史記表郡表邑於其前復按表標叙州叙縣於其後使重圖籍者一開卷之間而吾郡千百年之顛末指諸掌矣

←唐胄编纂完成的《琼台志》。

清代是海南方志存世最多的时期，其最早编纂的海南地方志是清康熙十五年（1676年）的《琼州府志》，知府牛天宿在此书的序文中说：“稽琼之有志，昉自汉唐，下迄故明，司徒唐公、宪副戴公，虽尝修之，迨万历丙辰以后五十余年”。这里所说的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所编纂的《琼州府志》，是最早的内容有组织、架构的著作，也就成为清代《府志》的范本。

在清代所编纂的本岛地方志中，小叶田淳依据清道光《广东通志》卷一百九十二《艺文略》以及其他各州县志的统计，发现本岛地方志数量众多，仅府、州县志，合计约有54种，其中《琼州府志》就有5种（4种存世）。清代海南的地方志，不仅表现在广域的琼州府的志书，而且进一步扩大为县级的志书，数量也大量增加。各县都有各自的志书。

海南现存最古的县志是清康熙八年的《乐会县志》，该书由林子兰修、陈宗琛纂，不分卷。岛内县志共44种，其中琼山县6种；文昌县5种；会同县4种；澄迈县5种；定安县4种；崖县3种，陵水县3种；乐会县4种，儋县2种；昌化县2种；万州志2种；临高县2种；感恩县2种。此外还有4种表明“已佚”者。当时的海南十三州县都有各自的志书，并多次修订，反映了清代海南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情况。

清康熙到清光绪年间时期，都是中国全国性的地方志编纂高潮时期，特别是在清康熙年间，各地都在编纂各自的地方志，作为地方官员地方政绩的具体体现。上述的统计数字，应该还有脱漏，未来还可进一步挖掘清代海南地方志的修撰情况。

民国时期因海南社会动荡，修志的工作较前代有所减缓。民国时期，共有6个县7部县志问世，而且都是在抗战之前完成的。民国早期的海南地方志还是承袭了旧方志的传统与体例，比如民国《琼山县志》、民国《儋县志》，只是内容上记述到了民国时期。

民国时期，海南史志的编写，是伴随着该时期人们对海南岛的关注而形成转型的。其中代表性的著作有两部，分别是《海南岛志》和《海南岛新志》。这两部地方志是新方志的代表，如《海南岛志》的很多内容都是以前的方志所没有的内容，特别是经济以及文化事业的变化情况。此书的影响很大，在民国时期就出现了多个日文译本。

据《海南地方志丛刊》（2004年海南出版社版）目录所记载，丛书收录海南方志（含南海诸岛）约有78种（包括8种《广东通志》），包括了府志、州志、县志和乡土志等56种，以排印本问世，可以说是目前最全的海南方志丛书。《中国地方志集成·海南府县志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版），收录海南方志17种，影印出版。

因地处偏远、保存条件等因素的限制，海南地方志印数不多，导致在世间少有传本，相信今后通过艰苦细致的挖掘工作，还会有更多存世海南方志重见天日，为绚烂的海南文化涂上重彩的一笔。

（作者简介：张兴吉，北京大学文学博士、海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史话春秋

瑰丽神奇的三星堆祭祀坑

■ 陈晨

三星堆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北部，本是当地人对三个凸起土堆的称呼。上世纪八十年代，这里曾因发现了两个土坑，出土了千余件青铜器、金器、玉器、象牙等，震惊了世界，唤醒了人们对三千多年前古蜀文明的记忆。其年代距今3200—3100年之间，相当于中原的商代中晚期。坑内器物经过砸毁和焚烧，却又分层有序叠放。发掘者认为这些器物曾作为祭祀之用，祭祀后被焚烧掩埋。

三星堆出土器物展现出的面貌与当时其他文化大异其趣，许多都是首次发现。如一号坑中的金权杖，一端刻有长46厘米的鱼鸟图案。二号坑出土了一件精美绝伦的青铜神树，通高3.6米，是已知全世界同时期最大的青铜单件器物。一号坑和二号坑还出土了100多件青铜人像，其规模在世界考古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通高2.62米的青铜大立人像，更是填补了中华青铜文化中缺乏独立雕塑艺术品的空白。青铜神树、雕像、金面具等，造型奇特，透着神秘诡异的气息。相关内容既不见于文献记载，也难与已知的文化类型建立很密切的联系。2011年至2017年间，多次的考古发掘发现三星堆遗址外扩城面积达3.6平方公里，是夏商时期中国南方最大的古城，最早的三星堆人可能与中国川西北高原有关联。结合周围发现的古建筑群和遗址，可基本确定这里就是当时古蜀国的都城，是我国境内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处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先秦古城古国遗址。所以，“外星文明”说当属无稽之谈。

也有说法据青铜头像和金面具高鼻大眼的特征，主张三星堆属外来文化。其实这种造型与古蜀国对“鸟”的崇拜有关，巨大的纵目面具可能是古蜀人对第一代蜀王蚕丛崇拜的体现，他的鼻子像鸟喙，耳朵则像翅膀，是人与自然的结合，反映了他们天人合一、人神互通的观念。

三星堆文化虽奇异独特，但与中原文化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大量的玉器明显有同时期的殷商文化特色，一部分与《周礼》记载的玉制礼器相合。青铜尊和青铜罍在形制、纹饰和制造工艺上与殷商文化类似，其中一件龙虎尊更是与安徽阜南出土的龙虎尊如出一辙。青铜大立人像上的兽面纹、云雷纹和夔龙纹等也是典型的中华传统纹饰。正如李学勤先生所说：“如果没有对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便不能构成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完整图景。”

2019年至2020年期间，考古人员在一、二号坑旁又发现了6座祭祀坑。出土的器物更是琳琅满目，如三号坑出土了通高70厘米的大口尊，是我国商周时期最大的青铜尊之一，还有最大的青铜面具和被发掘者戏称为“奇奇怪怪”的青铜顶坛人像等；四号坑出土了扭头跪坐人像、属于典型中国文明的玉琮等；五号坑出土了体量巨大的金面具；六号坑发现了罕见的木箱，已整体提取，仍在整理和研究中；七号坑的镇坑之宝是一件青铜龟背形的网格状器物，还有许多龙形青铜器；八号坑出土了大型青铜神坛、青铜立人神兽、顶觚形尊蛇神人像等。目前共清理出超过1.2件器物。

中原商文化晚期的青铜器上有些出现了铭文，遗憾的是三星堆祭祀坑虽出土了数量惊人的青铜器，目前还没有发现文字。个别的器物上留下残存的丝绸，其上有涂写痕迹，是否是文字还有待研究，能够发现文字也是人们对三星堆遗址进一步发掘和整理的最大期待。同时，三星堆祭祀的细节，三星堆文化如何与中原文明交流，如此绚丽多彩的三星堆文明为何不见于文献记载等问题，都有待于更多的发现和研究来揭开谜底。

（作者简介：陈晨，武汉大学中国史博士，现任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三星堆遗址出土铜喇叭座顶尊跪坐人像。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资料图

读史侧翼

梁实秋与厚德福的渊源

■ 王凯

梁实秋在文章中多次提及北平一家名叫“厚德福”的河南馆子，对那里的饭菜赞不绝口。厚德福在前门外大栅栏一个窄窄的小胡同里，原是烟馆，附带着卖些点心之类的东西，后来实行烟禁，就改成饭馆了。厚德福门脸古老简陋，很不起眼，尽管门里灯火通明，香味扑鼻，但门口却只有一灯摇曳，怎么看也不像个饭馆。据说初到北平的人，晚上遇到有人在厚德福请客，在大栅栏走上两三个来回也找不到。

厚德福老板陈莲堂是河南杞县人，家境贫寒，小时曾经讨过饭，后来到京城闯荡，当过同仁堂药店的厨师。陈掌柜手艺很好，能做地道的河南菜，后来袁世凯当了大总统，豫菜声誉鹊起，厚德福也由此生意日盛，往来食客络绎不绝。

厚德福与梁家结缘，始于梁实秋的父亲梁咸熙。梁咸熙是位美食家，据他的孙女梁文茜回忆：“那时我们家是有几十口人的封建大家庭。祖父梁咸熙是个很讲究吃的人，自号‘饱蠹楼主’。当时家里虽然有高厨掌灶，但他依然经常到外面的饭庄或小馆去寻喜欢吃的东西。在他的影响下，小时候我常随祖父坐着洋车去品尝京城各家的美味。”在品尝京城美味的过程中梁咸熙与陈莲堂相识，于是便向这家豫菜馆投资，成了厚德福的股东。

多年以后，梁实秋去国立青岛大学任教，在他建议下，厚德福到青岛设了分号。梁在《酒中八仙：记青岛旧游》中回忆说：“厚德福是新开的，只因北平厚德福饭庄老掌柜陈莲堂先生听我说起青岛市面不错，才派了他的长子陈景裕和他的高徒梁西臣到青岛来开分号。我记得我们出去勘察市面，顺便在顺兴楼午餐，伙计看到我引来两位生客，一身油泥，面带浓厚的生意人的气息，心里就已起疑。梁西臣点菜，不假思索一口气点了四菜一汤，炒辣子鸡（去骨）、炸肫（去里儿）、清炒虾仁……伙计登时感到来了行家，立即请掌柜上楼应酬，恭恭敬敬地问：‘请问二位宝号是在哪里？’我们乃以实告。此后这两家饭馆被公认为是当地巨擘，不分瑜亮。”

厚德福颇有几样拿手菜，比如核桃腰、铁锅蛋、瓦块鱼、两做鱼等都是独门手艺，别有风味的，许多年后，梁实秋对此依然念念不忘，都将它们记在文章里。

厚德福是幸运的，因为梁实秋的文字，后人记住了这家河南馆子。

史志琼崖

唐胄与西洲书院

■ 陈有济

明代海南文教发达，建立了一批书院。琼山作为府城所在地，这里的书院有桐墩书院、同文书院、奇甸书院、西洲书院、崇文书院、石湖书院、粟泉书院等，其中的西洲书院，位于今天的琼山府城攀丹村。历史上攀丹村的科举蔚然，与西洲书院有一定关系。

西洲书院的创建者，是攀丹进士唐胄。唐胄（1471年－1539年），字平侯，号西洲，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进士，官至户部左侍郎。唐胄耿介孝友，为官清廉，立朝有执持，任上积极推行教育，革除弊政，鼓励垦荒，平定地方动乱，政绩显著，被誉为“岭南人士之冠”，有《传芳集》、明正德《琼台志》等著作传世。

西洲书院建于明正德年间。正德七年（1512年），唐胄以母老乞归养。归乡养亲期间，唐胄将家中藏书重新整理，建起一座藏书楼，既作为自己的读书之所，也用来教育子弟。

书院创建之初，广东参议张简为藏书楼题写了“养优书院”的匾额，以表彰唐胄“弃官归养而学”的善举德行。“养优书院”的“养”字，一语双关，包含两重含义：一是指孝养父母，二是指个人的学养、修养。

唐胄归乡，一方面孝养母亲，另一方面也在通过读书继续提高自我修养。创建书院这件事，反映出唐胄做到了“学而优则仕”，也做到了“仕而优则学”。

养优书院的背后，还有这样一段佳话。唐胄居家奉养母亲，母亲自然是高兴的。然而唐母更希望儿子继续当官，为社会做出更多贡献。有一次，唐母对唐胄说，做人不能只满足于乡里的荣耀，而应该入仕为官，争取以他的才干获得君主重用，为社会服务，成为国家的光荣，这样才能不辜负唐父藏书的初心。

唐母还用书院里书籍的摆放打比方，说书屋里的书籍按规定的位置排列，方能井然有序，可以想见国家也是如此，只有人才各在其位，才能正常运转。自古忠孝是一体，古代的忠臣多是君主从孝子门第中选拔的，她让唐胄以此自勉。唐母的话不无道理，可见她是一位深明大义的母亲。

唐母虽然极力劝说，但唐胄仍坚持己见，一直在家奉养母亲。到了正德十四年（1519年）冬十月，这时唐母已经去世，琼州按察司副使王弘劝唐胄移孝作忠，出仕报国。王弘还将养优书院易名为西洲书院，并作《西洲书院记》一文，详细记述书院成立始末。

王弘规劝，加上母亲已经离世，唐胄终于重新走上仕途，先后任户部主事、员外郎，广西提学佥事、云南按察司副使（充金腾兵备道）、云南提学副使、云南右参政、云南右布政使、广西左布政使、右副都御史南赣巡抚、山东巡抚、南京户部右侍郎、户部左侍郎等职。短短十余年间，唐胄从主事升到户部左侍郎，官途顺畅、平步青云，他的好友钟芳有一篇《祭唐西洲文》称他“处而有养”“出而有为”，可谓非常准确的评价。

嘉靖十七年（1538年）夏，明世宗欲以生父兴献王朱祐杬祀于明堂配上帝（编者注：朱祐杬系明宪宗第四子，生前为藩王，死后追谥为帝，庙号睿宗），遭到部分大臣的反对。身为户部左侍郎的唐胄也上《明堂享礼疏》抗争，“疏入，上大怒，下胄锦衣狱，出为民”。唐胄忤旨下狱，削籍归琼，成为明代因抗疏而入诏狱的第一位海南人。同年冬，唐胄遇赦恢复官职。

嘉靖十八年（1539年）四月，唐胄卒于家，享年六十九岁。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朝廷追赠唐胄都察院右都御史（正二品），赐祭葬。

文史荟

投稿邮箱 wsh_hndaily@qq.com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 邮编：570216 总值班：66810666 广告许可证：琼工商广字015号 广告部：66810888 发行部：66810999 海报集团新闻热线：966123 邮发代号：83—1 报费：每月45元 零售每份1.5元 昨天开印时间4时18分 印完：7时10分 海南日报印刷厂印刷